

史學方法論



[史學方法論_下载链接1](#)

著者:伯倫漢

出版者:上海商務印書館

出版时间:1937-3

装帧:平装

isbn:9789571100975

19世纪后半期，西方学界弥漫着“科学主义”思潮，所有学术都必须符合科学的要求才能为人所接受，故而史学的专业化开始提上日程。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语言考据学方法，经过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1831)、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等人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治史程序。在史学专业化的驱动之下，这套方法被加以系统整理，编写成教材，以供大学历史系训练专业化史学工作者的需要。1889年，德国史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 1850-1942)率先撰写出版《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1897年法国实证派史家朗格诺瓦(C. V. Langlois, 1863-1929)和瑟诺博司(Ch. Seignobos, 1854-1942)亦合著《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一书。如就方法而论，《史学原论》仅承袭伯伦汉之说，并无创新，但行文简要，颇受治史者的欢迎。①这两本著作作为史学的专业化、学科化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被赞誉为近代史学“双璧”。此后，探讨史学方法的作品日渐增多，如鲍尔(W. Bauer)的《历史研究法导言》(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文森(J. M. Vincent)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 An Outline of Theory and Practice)、约翰森(A. Johnson)的《史家与史料》(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弗领(F. M. Fling)的《历史方法概论》(The Writing of History)等，此类著作在理论上都奉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为圭臬。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不仅对西方史坛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对东亚史学，尤其在日本、中国的史学专业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全面考察伯伦汉史学在东亚的流传和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东亚现代史学传统中的西方资源。

伯伦汉在历史研究领域有多方面的成就，但他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则是由《史学方法论》奠定的。这本书阐述了历史学的概念和本质、史料的分类和搜集、史料的考证、史料的综合与编写。作为兰克的再传弟子，他对兰克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了系统整理，《史学方法论》强调：“探讨解释、结合、综观及叙述等方面之反求作用，兰克氏亦曾致力于其形成，其工作殊不易以数语了之，著者惟有承认本书中有关此之诸篇，其中大部分之知识及规例，均系得之兰克氏之实例及启发者。”②伯伦汉继承兰克史学遗产，在德国史学界声誉盛隆，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曾这样评论：“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即是伏尔泰、伯伦汉与我自己。”③可想而知他在19世纪末西方史学界地位之高。

《史学方法论》问世不久，即流传到日本，对日本史学的专业化起到了规范性作用。众所周知，明治之前所谓的“日本史学”，只是我国传统史学的旁支或附属品，日本国史名著如《六国史》、《本朝通鉴》、《大日本史》、《日本外史》、《日本政纪》及《国史纪事本末》，都模仿中国“编年”、“纪传”、“本末”等体裁，且完全用汉文编写，这种情况一直到明治初年仍然没有多大改变。但后来明治政府推行“脱亚入欧”政策，不仅在政治体制方面取法德国，而且在学术制度建设层面也以德国为模板。1886年东京大学改为帝国大学，1887年其文科大学设置了史学科，聘请德国史家路德维希·利斯(Ludwig

Riess, 1861-1928)担任教授。利斯于1880年考进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在大学期间，曾做过兰克的助手，抄写兰克的手稿。他一生虽然只见过兰克两次，但日后治史深受兰克的影响。1884年他到英国、爱尔兰搜集资料，撰写《中世纪英国议会选举》一文，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887年，他被日本政府邀请，到帝国大学讲授“西洋史”和“史学方法论”。在他的倡议下，日本成立了史学会，并创办历史专业刊物，为日本史学专业化作出了杰出贡献。利斯在日本期间，积极宣扬兰克“如实直书”的科学史学，这为随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在日本的广泛流传准备了思想基础。不久，留学欧美的学生陆续返回日本，以帝国大学为据点，教授严谨的史料批评。与利斯同为史学科教授的坪井九马三(1858-1936)，于1887年留学欧洲进修史学，曾在柏林、布拉格、维也纳、苏黎世等大学留学。1891年回国直接升任教授。他完全继承了兰克的“科学”史学，著有《史学研究法》，被被誉为日本近代史学之父。他的治史方法与兰克、伯伦汉、利斯是一脉相承的，发扬了兰克的史学方法，而摒弃了其观念论。1902年利斯回国后，箕作元八(1862-1919)接任教授，他亦曾留学德国，深得兰克科学史学的精髓。坪井、箕作是明治、大正时期日本西方史学界的最高权威，坚持了实证史学传统。带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1903年日本史学界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兰克学术活动，坪井、箕作等人发表了

演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兰克史学已经融入了日本近代史学发展之中。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掀起留日高潮，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将兰克史学输入中国，而主要媒介则为教科书：一是西洋史教科书④，二是史学概论性质教科书。清末史学界从日本翻译和编译的史学方法性质论著主要有：(1)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第2年第9、10期发表的《史学概论》；(2)1903年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在中国出版了多种译本；(3)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部分章节被译成中文，如1903年《汉声》(原《湖北学生界》)第6、7、8期译刊《史学研究法》第四卷“史论篇”中的一章《史学之根本条件》，1907年张玉涛在《学报》第1年第6、7号译刊《史学研究法》的《序论》和《历史之种类》两章；(4)1903年《游学译编》第10册译刊《史学肆言》；(5)1907年吴渊民在《学报》第1号发表《史学通义》。此外，当时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卷首“绪论”或“通论”部分，多论及史学方法问题。

“史学方法”最为经典的教材应属伯伦汉《史学方法论》。这本书的方法论知识于20世纪初从日本间接传入中国，不过到了20年代才引起人们的重视，1937年陈韬翻译该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伯伦汉”逐渐在我国史学界家喻户晓。与《史学方法论》属于“姊妹篇”的是《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因为《史学方法论》体大思精，非为一般读者所作，大多数读者不能领会其中奥义，所以1905年伯伦汉出版了一部小书——《史学导论》，理论和方法根据前者，但阐述简要，在世界各地流传很广。民国时期留德学生如姚从吾、张贵永，回国后任教于各大学历史系，都向学生介绍过《史学导论》。在日本，《史学导论》曾由坂口昂、小野铁二合译成日文本《历史入门》(历史とは何ぞや)，岩波书店1922年出版。朱谦之的《历史哲学大纲》、杨鸿烈的《史学通论》、卢绍稷的《史学概要》也引征过日译本。

伯伦汉的史学方法在民国时期各大学历史系开设的相关课程中得到了推广。1917年北京大学史学门初建之时，即开设“历史学原理”课程。(21)1918年北大在专门以上各学校校长会议上讨论：史学之附属科学概论、史料收集法、史料审定法、史料整理法、史料编纂法。(22)1929年开始，傅斯年在北大主讲“史学方法导论”课，内容侧重中国、欧洲史学观点之演进、自然科学与史学之关系、史料之整理方法等。(23)据台湾学者王汎森研究，傅斯年十分喜爱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以致读到书皮也破了，重新换了书皮。《史学方法论》是他在北大教授史学方法导论的一本主要参考书。他在北大讲授这门课程期间编有讲义，凡七讲，现仅存第四讲史料论略。他指出：“史科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处理每一历史事件，每每取用一种特别的手段，这手段在宗旨上诚然不过是比较。”(24)傅斯年注重比较方法在治史中的应用，似乎受伯伦汉的影响。《史学方法论》认为比较法“不仅可使人求得总共之处，且可用以决定个别事物，知其与他事物间之相同及相异者何在”(25)，视比较法为研究法中之最重要者。当然，傅斯年史学思想渊源具有多元性，留欧期间他还受过英国史家巴克尔的影响，30年代曾翻译《英国文明史》前五章跟史学理论和方法密切相关的内容，自己又撰写《地理史观》一文(26)。巴克尔追求的目标是要将历史学建设成如同自然科学的学问，要与之并驾齐驱，这与傅斯年当年孜孜以求“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可谓西方声音在东方的回响。傅斯年在北大的讲义稿第三讲“统计学与史学”，十分欣赏用统计学方法研究历史，这与巴克尔《英国文明史》极力倡导统计治史方法也有一定的联系。

在中国史学的专业化进程中，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间接或直接影响到我国史学专业化的方向。伯伦汉史学渊源于兰克，但他并没有如实呈现兰克的多面性，突显的是兰克在史料考辨方面的贡献。伯伦汉对兰克史学的取舍，或多或少会干扰到傅斯年对兰克的认知。傅斯年当年振臂一呼，高举“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旗帜，对民国史坛产生了深远影响。通常认为我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受到兰克史学的影响，而事实上民国史家包括傅斯年本人很少研读过兰克著作，对兰克史学的理解大半是借西方史学史或史学概论性质的著作而获知，《史学方法论》则是民国史家理解兰克史学最为常见的一种读物。在民国史家观念中，中国现代史学建设的模板恐怕应该是以兰克史学为基准的，而大多数民国史家眼中的兰克却是不折不扣的史料派，这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取向。经过伯伦汉过滤的兰克史学，只剩下史料学，所以傅斯年才有那个惊世骇俗的口号。因

此，准确地说，影响中国现代史学进程的是伯伦汉史学，或者说是“伯伦汉心中的兰克史学”，对我国现代史学产生直接作用的是伯伦汉而不是兰克。

李孝迁 《德国伯伦汉史学东传考论》 《史学月刊》(开封)2009年2期第97～106页

作者介绍:

1850年2月19日，伯伦汉出生在德国汉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先后在柏林、海德尔堡(H eidelberg)、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哥廷根(Gttingen)大学攻读历史。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以《洛塔尔三世与沃尔姆斯协定》(Lothar III.und das Wormser Konkordat)一篇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874年出版博士论文，成为这一领域相当出色的学者，那时他年仅24岁。1875年，他在哥廷根大学谋得一个教席，继续从事沃尔姆斯宗教协定研究。1878年出版《沃尔姆斯协定的历史》(Zur Geschichte des Wormser Konkordats)，奠定其在德国史学界的地位。两年后又出版《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Geschichtsforschung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1882年，参与编辑《鲁普雷希特王朝时期德意志国会档案》(Deutsche Reichstagsacten unter Ruprecht)。1883年离开哥廷根大学，任教于格拉夫瓦尔德(Greifswald)大学历史系，一直到1921年退休。1889年在莱比锡出版《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同年晋升为教授。在威廉·阿尔特曼(Wilhelm Altmann)的协助下，1891年在柏林出版《中世纪德意志宪法史注释选集》(Ausgewhlte Urkunden zur Erluterung d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Mittelalter)。伯伦汉不是一位书斋式的学者，对社会教育事业颇为热心。1898年在柏林出版了一本仅80页的小册子《大学课程与当代要求》(Der Universitts-Unterricht und die Erfordernisse der Gegenwart)，对德国大学教育制度提出了深刻的批评，在教育界产生了积极影响。1899年当选格拉夫瓦尔德大学校长。为了表彰伯伦汉在学术、教育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德国政府曾给他颁发了红鹰(Red Eagle)奖章。

目录:

[史學方法論_下载链接1](#)

标签

史学理论

历史学

历史

史學理論

料

港台

方法论

文化史

评论

第一次用pad读完一本五百多页的书 近视涨了10度吧

竖排。钱说春秋五例三阶已涉其二

[史學方法論_下载链接1](#)

书评

现代史学权力的兴起——伯伦汉《史学方法论》读后
传统正史建立的纪传体书写方法，其核心要义并不在于这种体例本身，而在于其赋予的资政实用主义。因此，即使此后产生通典、会要等体裁，乃至明清不断编纂经世文编与地方进行方志修纂，体例虽然变换，其实均属于传统政治的附属物...

[史學方法論_下载链接1](#)